



文学·美学丛书

唐宋古文纵论

王永 著

Tangsong

Guwen

Zonglun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王永，吉林长春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散文方向。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散文及唐宋文学，出版专著《金代散文研究》等；主持完成教育部及北京市等各级科研项目多项；在《光明日报》《民族文学研究》《现代传播》等期刊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曾为韩国首尔大学、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韩愈研究会会员、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辽金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文学·美学丛书

唐宋古文纵论

王永 著

Tangsong

Guwen

Zonglun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古文纵论/王永著.--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657-2654-5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研究—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90552 号

唐宋古文纵论

TANGSONG GUWEN ZONGLUN

著 者 王 永

策划编辑 李水仙

责任编辑 李水仙

特约编辑 赵志华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责任印制 李志鹏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或 65450532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654-5/I·2654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钟 涛

王永老师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的第一反应是敬谢不敏。如果说亭林先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语,还可用不得已推托,樊川居士“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之言,则令我惶恐不敢下笔。然而,王永老师与我同一教研室共事多年,合作甚为愉快;我们都喜欢古代散文著述,日常也颇有学术上的砥砺切磋,当他提出写序时,我竟不好意思坚决拒绝。通读书稿后,延宕日久,姑且谈一点读后感吧。

从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近些年颇为流行,成果也多,有渐成显学之势。但相较于对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体裁的研究而言,以传播学和接受美学观念来认识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著述还不多。究其原因,在于古代散文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文学研究滞后性。中国古代散文与文学四分法中的“散文”并不等同,古代散文的内涵与外延具有包容性与流动性,不仅指抒情写景的文学散文,还包括政论、史论、传记、墓志、杂文等各体文章,而且广义的中国古代散文也不仅限于集部之文,还包含经部、史部、子部之文。就中国古代散文的书写传统来看,无论书写者还是受众,大多未将散文定位为一种纯文学写作。古代散文更具鲜明的“实用性”特征,在古代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中发挥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成为古代思想、文化、文学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呈现。古代散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古代散文研究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同时部分消解了古代散文文学研究的独

2 ◇ 唐宋古文纵论

立性。文学研究新的思维理念、新的价值取向、新的角度与方法,相较于其他文学门类,古代散文研究中应用得并不充分,很多研究还停留在某些固定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模式上。王永老师将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理念引入古代散文研究中,很新颖且具有学术意义。

唐宋古文道统和文统明确,除政治、哲学等功能性书写外,还有相当部分是发自性情的文学之声,具有更多文学艺术魅力,是古代散文由应用性转为文学性的重要文本。自此之后的古代散文史,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对唐宋古文的不断追想和摹写,十分适合进行接受研究。王永老师大作研究重心在唐宋古文纵向的源流讨论,尤其是在金元的传承研究上,他自言是“立足于接受意义而不是发展意义来谈金元散文”,这是符合实际的。中唐和北宋古文大盛时期与金元相去不远,风流未沫,传承脉络清晰,从传承和接受角度观照唐宋古文、金元散文发展的关系,理论上有一定高度,文献条件也足够。

引入新的理念和方法后,怎样贯彻在研究实践,并与研究对象实际圆融结合,成为立得住的一家之言,是研究者要面对的难题。王永老师该书的部分章节,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论述金代散文“国朝文派”对唐宋古文的接续,南渡名家对欧、苏文风的倡导,遗民作家的宗韩之风,元代文坛三大作家群的宗尚观念等,都细腻梳理了唐宋古文与金元散文创作和理论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在论述金代的文脉之争和文意之争时,认为金代文坛总结自身文脉,唐宋古文的传承色彩鲜明,并将此与接续汉文化传统方面的意识相联系,认为金代文人集团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本朝文盟谱系的话语权。这种基于金元散文对唐宋古文宗法对象不同,以及金元传承唐宋散文中具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的论述立场,确乎是从接受意义来讨论金元散文的发展的。王若虚《滹南文辨》和李滄《文章精义》中的唐宋古文批评,体现出金元传承唐宋古文的理论自觉,王永老师选择二者作为个案来解剖,点面结合地分析金元散文批评如何吸纳唐宋古文传统的养分,这

些细节批评和理论视域,传达了他力图还原金元散文发展历史场景和建构金元散文批评理论的学术追求。

王永老师致力于唐宋古文研究,尤其是对金代文章之学独有心得,有大作《金代散文研究》。现在他又打通唐宋金元,并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这本新作,可喜可贺!

目 录

第一章 易学思想与唐宋古文 / 1

一、三才之道与韩愈古文 / 1

二、《易传》与柳宗元山水游记成因 / 12

三、《古文四象》的唐宋古文选目 / 19

第二章 儒家情怀与唐宋古文 / 34

一、欧阳修书简中的文学交流 / 34

二、欧阳修碑志文与宋初士人的言事热情 / 45

三、立德追求与文天祥碑志文新变 / 55

第三章 唐宋古文家性情论及其金代总结 / 65

一、“性”“情”分和 / 66

二、“情”之凸显 / 68

三、以“情”定“性” / 69

四、因“情”解经 / 72

五、“中”“诚”立情 / 74

第四章 北宋文赋创作及其金元回响 / 79

- 一、“文赋”概念探源及范畴界定 / 80
- 二、宋代文赋的出现及《秋声赋》的意义 / 81
- 三、苏轼、苏辙的文赋成就 / 83
- 四、各辟蹊径的苏门作家文赋 / 87
- 五、欧、苏文赋的金元回响 / 91

第五章 金代散文创作的传承与发展 / 98

- 一、“国朝文派”期对唐宋古文传统的接续 / 99
- 二、南渡文坛：文坛名家对欧、苏文风的倡导 / 106
- 三、易代文坛：遗民作家的宗韩之风 / 112

第六章 金代文坛的文脉之争与文意之论 / 117

- 一、文脉之争 / 118
- 二、文意之论 / 127
- 附：明人王文禄《文脉》对唐宋古文的接受 / 129

第七章 王若虚《文辨》对唐宋古文的批评 / 132

- 一、金代学术思潮下的《滹南文辨》 / 132
- 二、《文辨》韩、柳古文批评论 / 136
- 三、王若虚对欧、苏古文的比较 / 148

第八章 元好问的文献传承实践与文化传播理念 / 159

- 一、文献传承实践：个人志趣与史家情怀的关联历程 / 160
- 二、文化传播：理论与观念的探索与创新 / 163

第九章 唐宋古文与元代文坛三大作家群 / 169

一、北方作家的宗韩与宗古 / 170

二、江西文派对“庐陵欧阳公”的效法 / 176

三、浙东作家对江西文派宗尚观念的呼应与发展 / 180

第十章 元人李淦《文章精义》对韩、柳、欧、苏的评点 / 185

一、韩愈批评论 / 185

二、柳宗元批评论 / 189

三、欧阳修批评论 / 190

四、苏轼批评论 / 191

五、韩、柳、欧、苏比较论 / 194

附录 元人陈秀明《东坡文谈录》补注 / 198

参考文献 / 222

第一章 易学思想与唐宋古文

一、三才之道与韩愈古文

天、地、人“三才”是《易传》中提出的考察问题的三个角度，“三才之道”可以总结为“时”“位”“势”三个核心要素。韩愈散文中对这三者的接受和运用是非常明显而又高妙的，伤时、求位、造势这些思路融进了他的散文写作中，形成了他文学创作上独特的风格。文学写作离不开感性体验，也离不开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引领，而后者多作用于文章结构的创设，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可以借此深化。

“三才”是《易传》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易·系辞下》云：“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又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天、地、人这“三才”不仅是组成六爻的基石或者说连接阴阳与八卦的过渡，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独特思维方式。

《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种天、地、人三观之法是非常具有实效的思考角度，“天时”“地利”“人和”因此也成为传统文化中经常被运用的要素。换个哲学术语说，天道，是“时”；地道，是“位”；人道，是“势”。

《说卦》在每一个“三才”要素上又确立了辩证的对立范畴,即辨明“时”的“阴/阳”,辨明“位”的“柔/刚”,辨明“势”的“仁/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现象观察模式,“三才”的有无、动静与境遇的吉凶、悔吝密切相关。

《易》为儒家“五经”之一,韩愈作为儒家思想在唐代重要的继承和传扬者,对《易》的谙熟可想而知。他在诗文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用到《易经》中的语句和观念。《招杨之罟》(其二)云:“《礼》称独学陋,《易》贵不远复。”即用《复卦·初九》“不远复,无祇悔”之语。而《梁国惠康公主挽歌二首》(其一)中有“巽宫尊长女”之句,则取《说卦》巽“为长女”之意。

在散文创作方面,韩愈对《易》的直接运用远不如宋代古文家频繁,在理论建树方面,也没有单就《易》生发出重要的论断,仅在《进学解》中罗列百家渊源时用“《易》奇而法”一句带过。然而,正是这简单的一句,已经足以勾连起韩愈对《易》的受容。因为“奇而法”正是韩愈的文风追求,也是其最终实现了的文风特色。^① 只是由于直观材料缺乏,长久以来学者们忽视了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其实从“三才”这个视角切入,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易》对韩愈散文的深刻影响。

《送董邵南序》是韩愈散文中颇受重视的一篇,对于此文,“妙在转折”“婉而多讽”等评价不胜枚举,然而真正将其结构脉络剖析出来的评点却难见到。其实,如果从“三才”的角度来分析,倒是十分清晰。韩愈对于董邵南的“不遇时”(天)、“郁郁适兹土”(地)、“连不得志于有司”(人)是深切同情的,悲叹了其在京师的处境是三才皆不利,与“怀抱利器”的仁人志士愿望不相吻合,使人不能不生出对“古”时“燕赵之地”的“慕义强仁者”的向往。行文之中,作者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而这正是文章的动人之处。“时”不可改,“势”不可得,董邵南希望通过改变所处环境(位)来摆脱困境,于是决定离开京师投靠河北藩镇。对

^① 周奇文.论韩愈散文的“尚奇”特点[J].社会科学战线,2005(5).

于这个决定,韩愈虽非常理解,但并不认同。出于友情的考虑,他没有直接反对,而是采取了婉讽的方式。虽云“吾知其必有合也”,但他马上又转而言曰:“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这里蕴含着深刻的“周流变化”的易学思维,既肯定了此行的“三才”之吉,又将这种吉归之于“古”。文章最后说:“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在质疑此去目的地(位)的“时”与“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动摇董生的想法,“位”之未必有合,此行自然前途未“卜”。就这样,韩愈灵活地运用以“三才”为基础的三组要素,通过它们各自的辩证描述,对董邵南的现实境遇进行了分析。重要的是,在“势”的问题上,韩愈虚拟了“明天子”来否定现实的“有司”,这使得全文在同情董邵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层寓意:看似礼赞,实际是呼吁和向往,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命运的感喟。韩愈非常重视君主的作用,在《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龙说》《获麟解》等文中均有体现。在韩愈看来,君主是改变“三才”境况的首要力量,是势、时、位联结的焦点。

像韩愈这样用“三才”分析问题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另一篇经典的散文《祭鳄鱼文》。作者先讲古时候圣王在位,鳄鱼不得天时,不敢在潮州嚣张为患,然后讲后代天子德行衰薄,所以鳄鱼乘时出来水边群体作怪,最后说现在圣明皇帝临朝,鳄鱼应当自动退避远海。这篇文章的“三才”观察法体现得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对实际问题的应对中,韩愈并非一定要对三种要素面面俱到地进行分析,而是常常针对具体问题着重从某一角度细致思考,这也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具体作品对“时”“位”“势”这三个要点的展现分别予以深入探析。

(一)对“人势”的营造

韩愈本是河阳人,其自附郡望昌黎,就包含着造势与借势的用意。尽管隋唐以后科举考试已经推行,但是魏晋以来门阀观念仍然势力强大。加之进士录取名额十分稀少,举荐之风盛行,在请托之时自谓望

族,无疑是人势上的阳变之举。在应举时,为了得到当权者的帮助,增加人气,这也是不得已之所为。除了调整郡望以造势,韩愈散文中更多的是干谒当权以借势。

韩愈出身孤寒,应考礼部进士与参加礼部铨选就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漫长的求官历程中,韩愈深深认识到“势”的重要性。在这封上书中,韩愈主要是希望当权者能以古代乐育贤才的名相自比,通过对伯乐的呼唤和培育来为自己的仕途创造机遇。在第一封上宰相书没有回音之后,韩愈仍不放弃,于是又有《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在这篇书信中,韩愈对宰相可能怀有的借口或者说心里可能存有的意识进行了设辩,他说:“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①在这里,韩愈主要处理的是“人”与“天”这两个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龃龉,意图封死对方的退路。如果宰相借口天时不利于韩愈这样的人才,那么韩愈已经告诉他了,在朝中,掌权者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改变天时,为人才创造施展才华的条件。

两封书信韩愈分别采取了鼓励和恳请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然而受到的冷落却是相同的,于是韩愈在最后一篇上书中终于采取了诘问的方式: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

^①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0.

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捉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①

这里的口吻是带有强烈锋芒的，可以读出其心中蕴积的不平，也透露出对“造势”的绝望。

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②

这段话的目的是希望权贵者伸出援助之手，即“借势”，但选取的说服角度又转为“地利”，是古今人才所处环境与选择条件之不同。春秋战国之际，游士可以朝秦暮楚，干谒诸侯。可是现在天下一统，除了京师之外，别无更好的出路，退隐山林又不是心忧天下的儒士所当为。在这里，韩愈解释了自己一再干请的苦衷，可惜当权者之“势”还是没有借来，当时宰相为赵憬、贾耽、卢迈，可叹其不遇时。韩愈若不自强，应该就这样被埋没了。

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云：“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

①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2.

②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3.

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①这是韩愈对人势的理想建构,但尚须地利与天时的佐助。

(二)对“地”“位”的寻求

所谓“地之道”,在大一统时期,主要体现为京师与地方的差别。这个空间的“位”对于士人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通过主动的转徙来改变的。其实除了这个实体性的“地”之外,还有人事上的“位”,也就是权力序列中所处的地位。这两个关键要素都是韩愈非常注意的。

1.对京师的眷恋

“人势”既然无可借助,“天时”又无力可为,韩愈只能在“地利”的改变上寻找出路,于是前往东都洛阳。在路上,自居为人才而离京的韩愈在《感二鸟赋》中与因羽毛漂亮而被进奉入京的两只鸟展开了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位的,但是主题却是京师与道路这种空间的争夺,正是“东西行者皆避路”引发了韩愈的感慨。他说:

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
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
行已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
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齿
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
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
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

^①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00-201.

无所容焉。^①

二鸟是“遭时”(阳),韩愈是“不遭时”(阴);对于京师,二鸟是进(刚),韩愈是退(柔),而东都的前景还吉凶未卜,无怪乎韩愈大发牢骚了。

欧阳修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认为韩愈的忧己之心不如忧国之心。在《读李翱文》中欧阳修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羨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②其实,这正可以看出《易》对韩愈的深刻影响。因为整部《易》都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谈论吉凶悔吝的,这是起点,但是不免也有局限,当个体的命运与家国的利益关联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突破这种局限,此时,“龟策诚不知其事也”(《卜居》),所以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语)。从上文中,我们当然只能看到韩愈对人才不平命运的耿耿于怀,对京师和天子的眷眷不舍,但是如果从韩愈整个人生历程和散文创作中看,韩愈对官位的认识是独特的,他的目的不是求官,而是希望能借此用权,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元和十四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犯颜直谏,劝阻唐宪宗将一段佛骨迎入宫内,结果被贬官潮州刺史。在潮州刺史任上,他再一次展开了对京师的追求。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云:

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③

①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② 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11.

③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18-619.